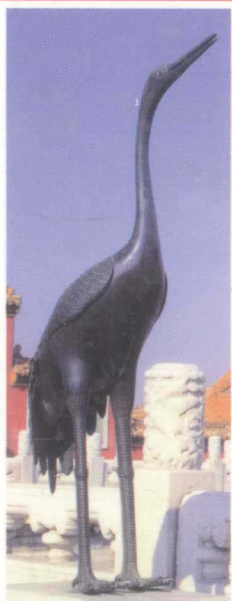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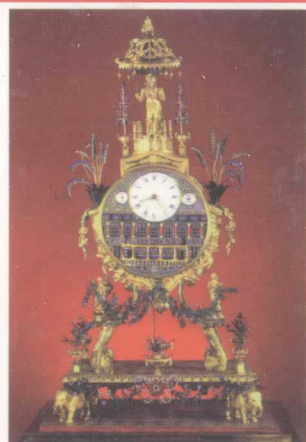
新编

上下五千年

Xin Bian Shang Xia Wu Qian Nian



南方出版社



新上下五千年

主编 XINBIANSHANGXIAWUQIQNNAN

第七册

隆 仁 主编



南方出版社

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大肆抢占胜利果实，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降，并对解放区发动局部进攻，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由于解放区的迅速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战情绪的高涨，以及完成进攻解放区的内战部署还需要时间，因此，国民党被迫采取和平欺骗的手法，以便争取时间，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于是蒋介石采纳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建议，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国民党的意图是：如谈得成，则利用谈判，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动一兵一卒地吃掉共产党，以达到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目的；如谈不成，则可发动宣传攻势，污蔑共产党破坏和平，作为发动内战的借口。蒋介石的谋士陶希圣曾露骨地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当时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不敢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因此，便“面对实际情况，企图协助安排一个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国民党政府势力的临时办法”。以便“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

地位，纳入一个宪政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敌对的两党将共同参加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费正清语）。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以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他认为中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虽然完全洞悉国民党的阴谋，但是，为了考虑到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考虑到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有承认中共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新阶段，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可能；或者可以通过谈判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即使和平不能实现，也可在谈判中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争取一切对美国 and 国民党还存在幻想的人们，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于是，便果断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主席亲自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前来迎接的张治中及赫尔利大使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到达重庆。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许多老朋友都很担心，也很佩服，柳亚子先生称赞他“弥天大勇”。重庆各阶层人士则把毛泽东的到来看成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令人欢喜的大事，奔走相告，街谈巷议，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毛泽东能够维系中国目前乃至未来的历史命运和人民幸福。许多外国记者也纷纷发出专电，称颂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

蒋介石本来只是摆出一种姿态，事先并未就谈判问题做什么准备，不料毛泽东真的来了，只好仓促上阵。28日中午，蒋介石紧急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只确定了同毛泽东



毛泽东在九龙坡机场。左为王炳南，右为赫尔利。

谈判的方针：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对政治之要求可予宽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其中政令军令之统一则为一切问题之中心。自8月29日到10月1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晤谈达9次之多。8月29日，毛同蒋第一次会晤。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以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中国无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3条谈判原则：一是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是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军令政令之统一；三是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

8月30日，毛泽东等拟定向国民党提出11条意见：（1）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



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前排左起：赫尔利、蒋介石、毛泽东，
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吴国桢。

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2) 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3) 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의 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4) 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5)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 重划受降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7)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8) 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9) 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代表；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计 10 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 4 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10) 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 16 个军 48 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11) 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9 月 3 日，将这一意见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9 月 4 日，蒋介石自拟谈判要点 4 条：(1) 中共军队之编组，以 12 师为最高限度；(2) 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3) 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4) 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从这一天开始到 10 月 5 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先后进行 12 次谈判。

国共谈判的焦点问题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企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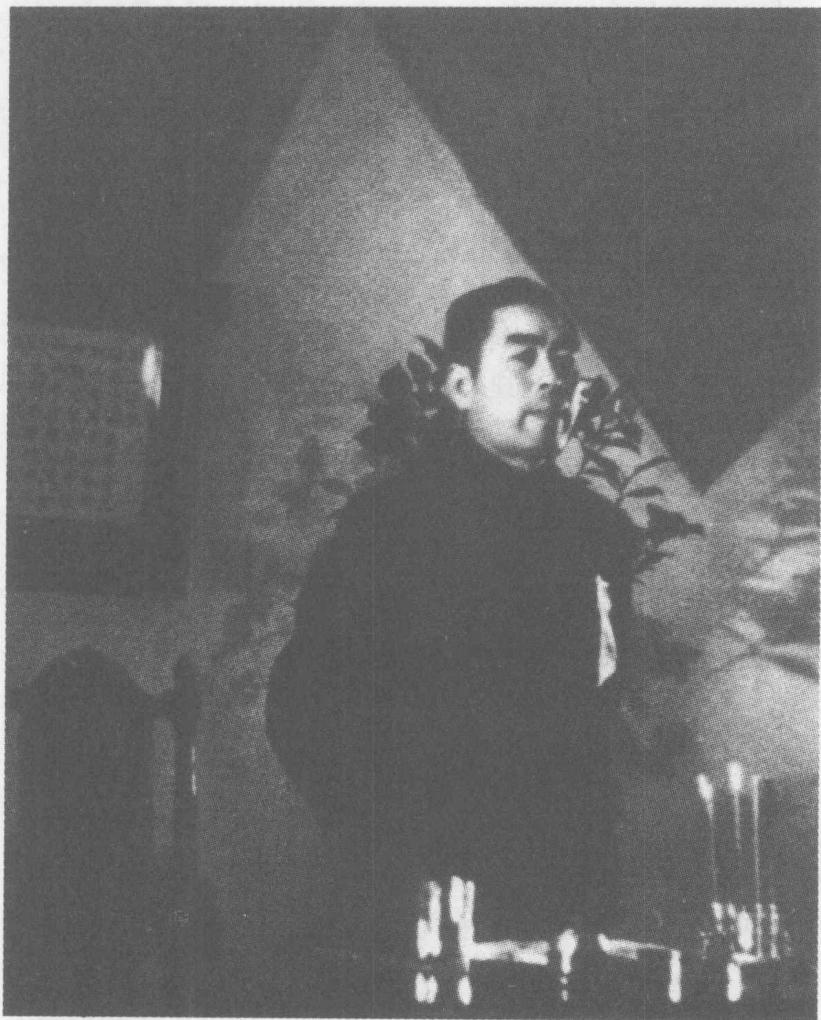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王若飞

中共放弃解放区和军队，派几个人到政府中去做官，中共当然不会赞成。9月1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对这两个问题再提出退一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可让到1:6，如国民党军队编为120个师，中共军可编为20个师，如国民党缩编为60个师，中共军

可为10个师。(2)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中共方面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8个地区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将苏北、皖北、豫北之军队撤退,中共军队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及陕甘宁边区等地。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3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中共推荐。对这一新方案,国民党方面认为违背军令政令统一,并指责中共搞分裂,意见未能统一。谈判一度陷于僵局。这中间,赫尔利曾找毛泽东谈话,要毛泽东承认蒋介石的意见,放弃边区和军队,否则只有破裂,毛泽东说,不承认也不破裂,还要讨论。谈判无大进展,毛泽东想及早返回延安,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毛的想法,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毛泽东原想10月9日返延,蒋介石留他过双十节,张治中也说,你这么大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不发个会谈纪要不行。故毛泽东多留两日。10月9日,蒋再次同毛泽东直接晤谈,仍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表示不能同意。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同王若飞一起回到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重庆谈判,有一些成果,国民党方面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双方同意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确认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讲话

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实行地方自治等。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问题，没有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权问题，中共方面先后提出几个方案，都被拒绝。尽管如此，重庆谈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以平等的方式，双方在纪要上正式签字，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本身就表明国民党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地位；另一方面，纪要内容，如和平建国、地方自治、人民自由等等，都是对人民有益的，蒋介石如果不实行，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因而，重庆谈判，中共确实取得了主动地位。而且，根据重庆谈判精神，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达成一定协议。后来，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就更加陷于被动。

蒋介石的谈判，确是一个缓兵之计。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陆军总长何应钦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印的《剿匪手本》。命傅作义部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调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攻。中共部队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击退傅作义部，并于10月上旬在上党地区歼阎部三万五千多人。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下达“剿匪”密令，严令各地对中共军队“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同时，命孙连仲部20余万人沿平汉路北上，进犯邯郸地区，命胡宗南部沿平汉路南下，造成对晋察解放区的夹攻之势。10月19日，傅作义亦指挥10万大军对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发动攻势。蒋介石并在美国的帮助下从空中和海上大量运兵至内战前线，11月初，杜聿明率两个军的兵力攻占山海关、绥中、锦州等

地，在东北挑起内战。针对此种形势，中共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民党，自己则控制次要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准备新的斗争。

1946年1月10日，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公布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上，蒋介石宣布4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释放政治犯。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会议通过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在机场迎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返回的周恩来。

《政府组织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5项决议案，否认了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

但是，从1月中旬停战协定生效起到6月下旬，国民党军总共出动兵力270万人次，向解放区发动了4300余次攻击，反共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中国的和平，中共一再忍让，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没有使战火进一步扩大。

在和谈掩护下，经过几个月的调兵遣将，蒋介石自以为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已经充分。6月25日，蒋介石对外宣布，国民党军“24小时内将有惊人之举”。

6月26日，30万国民党军队向被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狭长地区内的6万中原解放军发动正式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昆明血案

早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1945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为加紧内战准备，就频频在各地制造血案。

1945年11月下旬，在内战乌云密布的情况下，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省立英语专修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决定于25日晚，在云大致公堂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的问题。

国民党当局获悉这一消息后，昆明省党部主任李宗黄和警备司令关麟征，立即于24日晚召集云南省党政军各机关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如有此类事情发生，即由各该团体与学校主管人员负责。并逼迫云南大学校长熊迪之出布告禁止学生集会。

为此，各校学生临时改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上举行晚会。25日晚7时，晚会开始举行。到会者有五六千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依次发表了“中国政治之认识”、“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和“如何制止内战”等演说。

晚会进行期间，邱清泉突然率领第五军一部包围联大，并在学校四周施放枪炮，同时将电线割断，制造混乱。到会“群众，不为威胁和扰乱所动，改用汽油灯照明，派纠察队维持秩序，镇静如常，继续开会”。



“一二·一”昆明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最后，晚会通过了四校全体学生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和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等通电。

11月26日，西南联大等3所大中学校联合举行大罢课，成立了昆明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并向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军当局提出了惩凶、辟谣、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和赔偿损失等项要求。

下午5时，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召集省政府负责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以及各学校负责人开会，决定破坏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的办法多项。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并限令各校于28日复课。

但28日上午，学生罢课委员会宣布无限期罢课，发表了

《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在《同胞书》中，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

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学生的罢课斗争，得到了广大教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29日，西南联大全体教授发表《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表示了严重的抗议。

30日，当学生罢课委员会宣传队队员出发街头，向市民解释罢课原因时，竟遭身分不明的武装流氓殴打、枪击，当即有3名联大学生受重伤。此外，他们还捣毁了中法大学校舍，撕毁云大门前的壁报、标语。

12月1日，上午9点。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携带武器和各类凶器，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和联大附中，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到下午4时，惨案结束，有20余人受伤，4人死亡。震惊全国。

第二天下午，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4烈士入敛典礼，并设置了烈士灵堂。仪式庄严而隆重。

当日的下午，西南联大还举行了教授会议，抗议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随后，联大教授会议又定于4日罢教一星期，以“为死难同学致哀”，“对学生罢课表示同情”，“抗议云南省地方当局指使军队屠杀学生的暴行。”

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革命、反民主的暴行，激起了云南省人民群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愤怒。自四烈士灵堂设立后，半个月中，前往参加公祭的机关和团体达1000多个，人数计15万人以上，占昆明当时人口的1/2；群众捐款达3000

万元。诗人柳亚子沉痛题诗：“渝水天沉醉，滇京血怒流。丧心愤群丑，切齿誓同仇。”

国民党当局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怒和指责，迫于压力，不得不玩弄骗局。但这只能是弄巧成拙。国民党当局为遮人耳目，逃避罪责，由蒋介石授命，玩弄了一场“公审”和枪决“罪犯”的骗局。

12月4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云南省主席卢汉任审判长、李宗黄、关麟征任陪审员，对无业流氓陈奇达、刘友治等人进行了军法会审。审判中，李宗黄等人捏造了一个情节：共党分子姜凯以金钱与支队司令官相诱的情节。可恶的是，竟下令捉拿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共党分子姜凯，实际是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12月11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枪决。

昆明惨案的杀人凶手究竟是谁？一位目睹者曾严正地指出：制造流血事件的暴徒，实是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的共同指使。

国民党当局为平息民愤，于12月下旬将李宗黄调走。可是，1946年2月中旬，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竟又任命惨案凶手李宗黄为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之要职。这一任命，再次掀起了昆明人民的怒吼。

2月17日，昆明各界群众在联大草坪上举行了规模颇大的抗议集会。会后，数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3月初，昆明各大中学校师生3万多人，联合罢课一天，抗议国民党当局复任李宗黄，要求国民党政府履行各项诺言，惩治惨案的元凶。